

走近-楊逵小說卑微的撼動

作者：林麗青

書名：楊逵集

作者：楊逵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年02月初版第一刷 2006年11月初版第八刷

本書摘述：

楊逵原名楊貴，1905年出生於大目降，童年深受西來庵事件影響，而萌生反抗意識，就讀公學校時沼川定雄啟發了楊逵的文學興趣，就讀中學時閱讀了許多日文思想、文學及英法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文學作品，開啟了世界文學之窗。

為躲避童養媳而赴日大學半工半攻讀文學，在日本就學期間深受馬克思主義、普羅文學的影響，1927年因參與農民運動被捕兩次，1934年〈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1934年任《台灣文藝》編輯委員，1935年另創《台灣新文學》，1937年受入田春彥資助經營「首陽農園」，1948年創辦《台灣文學季刊》，1949年因簽署「和平宣言」被捕綠島入獄12年，晚年榮獲第六屆吳三連文學獎及台美基金會傑出人才獎，1985年逝世。

本書收錄楊逵多篇重要小說，〈送報伕〉描述東京苦學學生原以為送報工作可解決經濟困境卻因老闆的剝削而雪上加霜，情節安排反應自身留日的生活經驗，文中充滿了無產階級抗爭的社會主義思想。〈鵝媽媽出嫁〉也以個人經營首陽農園的經驗描繪農人勤苦的生活，文中院長因索鵝未成而百般刁難取款的心態恰恰搓破「大東亞共榮

圈」的假象，也呼應林文欽所提「不求任何回報而互相幫助，大家繁榮，才是真正共存共榮…」的理想。〈泥娃娃〉同樣取材自身寫作生活，全篇強力批判富岡之類趨炎附勢想利用百姓的苦難投機取巧而毫無人品情操的人，對於日本皇民化教育使新一代價值混淆亦感到憂心。除了〈模範村〉、〈增產之背後〉篇幅較長之外，其餘〈春光關不住〉、〈水牛〉…皆是短篇的小說。

楊逵小說主要內容皆以自身經驗為藍本，反應日治時期中下階層的貧病苦悶。質樸無華而寫實的筆調不賣弄文學理論更顯現「草根文學」的精神，然而其一生為理想而承受苦難卻永遠懷抱光明的企盼更為其文學信念增添實踐的說服力。

心得評論：

不平則鳴

楊逵自述「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童年目睹父親朋友當街被日本警察打死，然而在「西來庵」事件中的抗日份子卻是《台灣匪治》中的匪徒，統治者觀點對歷史的扭曲萌發了他的反抗意識，而後其閱讀經驗及在日本承繼的馬克思左翼思想使他採取一種更激進的實踐主義，他以寫作為途徑明指暗諷整個時代的弊病所在，小說中普遍存在反殖民主義、反壓迫、反階級獨占的主題意識—〈送報伙〉控訴日本資本家對勞工的壓榨，〈無醫村〉批判戰時民生配給的不合理，而窮人是只有在開死亡證明才會「看醫生」的，〈模範村〉中地主阮固對待佃農的鄙陋嘴臉…。

而事實上，楊逵不只是控訴不平，他多次參與的農民社會運動，不畏牢獄仍一再以行動及文學發表的方式來實踐他的理想；「我決心要繼承林文欽君的遺著，把〈共榮經濟的理念〉完成，為了彌補自

己的罪過，這是不可不做的…」一如〈鵝媽媽出嫁〉中對反抗行動的宣示之外，他更期許自己能像〈壓不扁的玫瑰花〉，即使在水泥塊般堅硬的日本軍閥體制下亦能衝破困頓抽出隱含希望的花苞。

「蓋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聖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楊逵亦相信文學是有力量的，承繼賴和的反抗文學路線，楊逵的個性活像是《水滸傳》裡好打不平的「黑旋風」李逵，只是他戰鬥的武器是他的文學和思想。

因為慈悲所以痴愚

「…從年輕到現在，我都是一個「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禮運大同篇中的社會…」楊逵關注的是中下階層的小人物在不公平的制度下承受的痛苦與磨難。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真實情況與寫實主義的影響，楊逵小說中常有疾病與死亡的描寫—〈模範村〉中的蔡木槌為籌措兒子的醫藥費瀕臨崩潰；〈無醫村〉中許多窮人無法就醫，而死在滿是名醫的街道附近；〈鵝媽媽出嫁〉裡的林文欽在咯血而死之前，完成二十萬字的〈共榮經濟的理念〉手稿…。他也反映壓榨與不公—〈模範村〉裡的日警和村長為爭取「模範村」虛名而任意支配村民勞動，禁止膜拜神明私課重稅，〈犬猴鄰居〉中鄰長和保正私貪配給而互揭瘡疤，〈種地瓜〉中的父親因被徵調當軍伕，而使經濟陷入困境…。

然而楊逵鬥爭的原動力毋寧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慈悲心。因此即使受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影響，而使無產階級鬥爭理論架構了楊逵創作思維，他卻不願因此而自限於非黑即白，左右二分的決斷中。在作品中常常是一種階級意識超越民族意識的情懷，我們處處看到楊逵對愛與和平理想的著眼點永遠是社會角落的弱勢族群，即使為他的理念而殉道似乎也在所不惜，一如他在小說中覺醒一般的陳述，他實踐著自

己的說法。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使他進出監牢如家常便飯，連結婚前夕也不例外，然而光復後「祖國」卻因為他起草了「和平宣言」讓他領了史上最高的稿費—綠島監禁十二年。此後他在身體與精神內外雙重的挫扼下，沉潛了他的文風，修正了他的反骨，為了理想，一個文學家耗損了他的創作生命。

晚年，他曾自喻愚公，願像愚公一樣的流血流汗永不灰心失望的努力墾殖下去。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說中，雖然描繪著黑暗卻也不忘帶給大家光明的遠景。他曾說：「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在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還寫過一首〈三個臭皮匠〉的詩：「好好學挖地，深深挖下去，好讓根群能紮實…繼續墾下去，紮根幹下去…。」楊逵的孫女楊翠也曾提到：「…他一方面深蘊憂鬱的生命本質，一方面卻又從中提出堅韌的生命能量；他無法排除焦慮和死亡的陰影，但總能找到逆轉的力量。…」因此我們總不難從他的作品中發現他像「西西里斯」一般「執著於善」的固執。

真誠無價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泥娃娃〉中身兼花農身分的作家一再以東方朔的〈嗟伯夷〉這首賦來呼應其志向，並且恰與富崗之流相應照。真實生活中，大約在1937年他因欠米店二十元借款而被告上法院，因為得到愛好文藝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彥濟助一百圓，清償債款後得以用餘款租用兩百坪土地開闢「首陽農園」，過著躬耕自足的生活，雖然勞苦卻也不改其樂。楊逵的小說總帶有濃厚的自傳性格，許多小說的題材常取材自身經驗，有時是花農、有時是作家、就連〈送報伙〉中的勞動身影也是自身在日本工讀的真實體驗，有的時候也常連同妻兒一起入鏡—〈泥娃娃〉裡嬉鬧的兒女、〈萌芽〉中堅韌的女性形象…。

或許是因為常取材自自身經歷或受到俄法小說的影響，楊逵的小說常以第一人稱為敘事觀點，他喜歡以對比的手法襯托善惡與美醜的相對特質，用象徵的手法一方面達到藝術的含蓄美一方面躲避真實社會情境的枷鎖，例如〈春光關不住〉中的玫瑰象徵的愛與和平及〈泥娃娃〉所隱喻的日本軍閥…；他也常用反諷的筆法取呈現一種黑色幽默的情調，〈泥娃娃〉中改換日姓的富崗，為了借錢發戰爭財而醜態百出，〈鵝媽媽出嫁〉名為「出嫁」事實上卻是一種另類的強取豪奪。

或許是因為堅持普羅文學、大眾文學的理念，他寫作的目的是以大眾生活為書寫對象，並希望藉此啟蒙無產階級大眾，使他們走向正確的方向與改革。楊逵認為：「普羅文學本來就應該以勞動者、農民、小市民為讀者而寫。…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與世界觀，積極地書寫知識份子、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等敵人及其同路的生活」，「真正鑑賞藝術的是大眾，只有少數人理解的不是藝術！真正的藝術是擄獲大眾的感情、撼動他們心魂的作品」也因此被評為質樸或單調的寫作技巧或許是他另一種「目的性」的書寫。何況，古今中外文學的價值不在譁眾取寵，而在於能發揮力量，「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因為真誠才是最動人的。

台灣文學的蒼涼路

我們該如何定義台灣文學？是台籍人寫的？在台灣輸出的？還是以台灣為主題意識的？至於台灣話文呢？其它族群呢？…，陳建忠在〈戰後初期楊逵的文學論述〉中提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歷史定位問題。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究竟台灣文學的日文傳統為何必然失去它作為文化資本的合法性？中國性的追求為何難以兼顧台灣特殊的文學傳統？文學場域中的權利爭奪，為何與政治場域中一般？由

中國大陸來台作家替換日本作家成為「重建」戰後初期文壇的主導者？台灣本土作家為何一再堅持在中國性之外（或之內），還必須有台灣性存在的空間？…」，在展望台灣文學的未來之前仍存在著台灣文學的定位之爭。

一個幾十歲的人，要他放棄原來熟悉的書寫工具，重新像小學生一樣學習中文而後再創作，是何等不堪的事？原本是小說、散文、詩、劇作、評論全方位的作家，或許能為台灣文學史綻放更多耀眼的光芒…；一些先輩作家中斷的文學生命是台灣文學史的悲哀也是世界文學經驗的損失。

因此評論楊達的文學不能不將語言轉換的問題列入考慮。陳芳明曾評楊達：「從純文學的眼光來看，楊達並不玩弄文字技巧，也不崇奉華麗的詞藻。在台灣仍有些文評者，嫌其作品過於粗糙。但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並不是給予感官上的滿足，而在於思想上的說服。…」閱讀台灣文學，或者是楊達的作品或許我們該有一個更貼近台灣的評論觀點，這樣我們才能更真實的理解與評價。

埃及政治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在〈資本主義：已成為人類公敵的過時制度〉中提到「…我們必須提出一種與社會主義理念一致的、替代性的人道主義的全球模式，以對抗當前主流的全球化思想。…」其實薩米爾·阿敏反階級反資本的立場與楊達的「人道社會主義」不謀而合，我們可以說楊達文學的價值在於所有的不公未能消滅之前，恆常的能夠發揮力道。反思台灣文學的未來，或許我們更需要一種「人道」的文學思維。

結語：

疏離、貼近

一直也是個依賴書寫生活的人，我能體會文學創作的孤寂感，相較於中國文學的閱讀經驗我的台灣文學經驗卻是淺薄、斷續而不明確的，何以如此？那是另一個探索的起點。

最早知悉楊逵是因為大學時在葉石濤的《走向台灣文學》裡發現，楊逵是台南縣新化鎮出生的，和我一樣。但在成長的過程中，卻從未有過任何相關的印象，這幾年婚後也常回到新化，若非看到斗大的「楊逵文學館」的新路標，我可能很難從家鄉親友的口中得知這項訊息。我與楊逵與台灣文學的距離原來該有某種貼近的淵源，但實際上卻是非常的疏離…，此番為了更完整的解讀《楊逵集》，我從其小說及他人對楊逵小說的研究及論述著手，並跨足台灣文學的主題，總算才對楊逵其人其作品及台灣文學的內涵有些粗略的了解。

等待一位台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然而就在去年十二月初，我企圖從葉石濤先生的創作資料中聯繫楊逵的印象時，才很錯愕的得知台文學學史上又失去了一位巨擘，如果老兵不死，如果老園丁不凋零，我們能等待台灣文學像等待一朵美麗盛開的玫瑰嗎？願以葉石濤先生的遺願—「等待一位台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為我們共同的心願，也追憶那些曾透過文字為這片土地吶喊的英雄。